

## 第五章 创建人民政府(1933-1936)

### 一、酝酿举事

陈铭枢在欧洲漂泊了半年多之后，一个重大的政治图谋，已在胸中酝酿成熟。1933年5月6日，他自法国回国到达香港。陈回国前，曾致电蒋、蔡等人，他们也曾去电对陈的计划表示赞成。陈铭枢到港时，蔡廷锴会同陈济棠的代表香翰屏以及张惠长、欧阳驹等多人亲去迎接。陈铭枢回国消息甫出，立即引起各方面的注意。记者向他追问回国意图时，他只淡淡地表示，“个人问题，绝无权利地盘思想，此次返国，纯抱冷静头脑以考察社会政治”，“今后行止，当以能否保持个人读书原旨为依归”。<sup>[1]</sup>对时局避而不谈，只表示他去南京出席中央全会不成问题，但此类会议往往议而不决，决而不行，言外之意，也就表示并无意去南京出席中央会议。陈铭枢的公开谈话，虚虚实实，半真半假，放的是让对手捉摸不透的烟雾弹，实际上，他回国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另开政治局面，发动反蒋抗日。他认为反帝必先抗日，而抗日必先反蒋，因为蒋的政策已成为抗日的障碍，反蒋抗日成为他追求的最直接的政治目标。至于如何实现反蒋抗日，如何动员各方力量，除已考虑与中共合作外，陈铭枢并没有从根本上跳出以往的思路，即仍是利用他以往在国民党内部的联系，利用国民党内的派系矛盾，以纵横捭阖的手段，发动政变，推倒蒋介石的统治。

广东的陈济棠，自把陈铭枢排挤出广东之后，掌握着广东的军政大权。但陈济棠毕竟和蒋介石有矛盾，而且从历史上说，陈济棠也曾是陈铭枢的部属，他们俩也曾合作分掌广东军政。合作期间，两人并没有很深的矛盾，只是在胡汉民被蒋介石扣留之后，两人政见不同，出现分歧，才导致决裂。这时候，陈铭枢已经脱离蒋介石，在反蒋这一点上，两人应该说是有了共同合作的基础。从利害关系权衡，陈铭枢认为陈济棠是当时最有实力与蒋介石抗衡的力量，而广西又看着广东，因此，他首先把视线转回到广东方面，希望策动陈济棠重新合作反蒋。陈铭枢回香港的次日即不辞辛劳，同蔡廷锴、香翰屏去了广州，主动登门拜访陈济棠。陈铭枢考虑到自己当年由于不赞成反蒋而被陈济棠逼出广州的情节，陈济棠不免会对自己存有戒心，因而一见面就声明完全支持他的反蒋主张，并称赞他同蒋光鼐与蔡廷锴的亲密合作。再三声明，自己此行回来，绝无权利地盘思想，仅以在野之身；帮助他们进行反蒋抗日活动。他对陈济棠明确而坚定地反复强调：“非反蒋不能抗日，非抗日不能图存”。但陈济棠只是唯唯诺诺，并无明确的表态，而把事情推到他搞的西南政委会和西南执行部去。第二天，在上述两个机构的公宴上，陈铭枢只好表示：“我们今后在政治上拥护胡先生，军事上拥护伯南（陈济棠字），我还要到福建去同憬然（蒋光鼐字）商量后再说，目前没有什么具体的决定。”<sup>[2]</sup>作为一个精明的地方实力派，陈济棠自知自己无力与蒋介石全面对抗，在自己的地位没有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他并不愿意轻举妄动。何况，陈铭枢在广东也有很深的影响，他并不敢掉以轻心，生怕请客容易送客难，与陈铭枢的合作危及自己的统治，因此只对陈铭枢敷衍了事。陈铭枢在广州逗留多日，对外不事声

张。回到香港后，他即紧张地与各方面反蒋的政军界领袖接洽。

陈铭枢并未因陈济棠反应不积极而灰心，他毕竟还有十九路军这张王牌在手，而且，他对陈济棠的不肯合作也有思想准备。在游说陈济棠不成后，陈铭枢即由蔡廷锴陪同，于5月17日离港赴闽。陈铭枢一到福建，公开对外称不作长期停留，不会再作“冯妇”，只是看望袍泽，有所贡献。但实际上，他对福建的行政、军事、经济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并“日日仆仆途中，来往闽南、闽西、闽北之间，指示各种政治措施及发表抗日救国之演说，以唤起民众”，对部队官兵尤其重视，“今日在某团体演讲，明日又到某军训话，对政工人员更格外留神，大有不抗日则不谈革命，则民族不能救、自身不能保的神气。”<sup>[3]</sup>陈铭枢到福建，是为了实现自己的反蒋抗日计划，他以为在福建，政权方面有蒋光鼐，军队方面有蔡廷锴，自己居间指挥协调，一定能成一番事业。而实际上，十九路军内部情况十分复杂，并不能供他随意指挥。

十九路军是1932年6月奉命调往福建，对付中国工农红军的。蒋光鼐由于对时局不满，即秘密离开上海，经香港回广东东莞老家休养，从事公益事业。不久，国民政府又擢升蔡廷锴为十九路军总指挥兼十九路军军长，蒋光鼐调升驻闽绥靖公署主任，撤消卫戍司令长官部，长官部所有人员，拨归绥靖公署。公署驻福州，由邓世增任公署参谋长。由于蒋光鼐在老家迟迟不出，地方军政事务无人主管，邓不敢独断，办事甚为棘手。蒋光鼐被调离十九路军，显然是蒋介石分化十九路军将校、控制十九路军的一种手段。为此，蔡廷锴亲自到蒋光鼐的老家，请蒋复出，共同领导十九路军，并表示如蒋不出，他也将回罗定老家休养。蒋光鼐这才随同蔡廷锴前往广州，于9月底赴福州就任。这一年的12月，国民政府改组福建省政府，调蒋光鼐任福建省政府主席，蔡廷锴为驻闽绥靖公署主任。绥靖主任指挥全省军政，蔡廷锴由此在职务上凌驾于蒋光鼐之上，军事权力更集中到了蔡廷锴一个人身上。蒋介石分化十九路军的图谋十分明显，蔡不便任职，只是在蒋光鼐力劝以大局为重之下，方才就职。

蒋介石调十九路军到福建，一个重要原因是让十九路军在“剿共”战争中自行消耗。蒋光鼐与蔡廷锴也知道蒋介石的用心，到闽后一直对红军采取消极避战态度，力争双方相安无事。为了稳固与苏区接壤的闽西一带的形势，搞了计口授田试验，将中共所分田地，重新分配。又为了搞好与广东的关系，蒋光鼐于1933年初，派省府秘书长李章达去广州，与两广当局订了个粤桂闽三省联防草约。草约共15条，分为军事、政治、经济几个方面，规定三省互助，一省被侵，他省应援，实际只是个形式。粤、桂两方各有自己的小算盘，粤方是想保持半独立地位，防止十九路军拥蒋，桂方是想用来壮大声势。而十九路军部队本身，在多年流动作战之后，获得一块地盘，军官们开始成家立业，并且腐化起来，部队官兵经过对日作战的光荣历史，更不愿意进行内战，士气就很成问题。蒋介石则千方百计企图派人打入十九路军内部，分化收买高级将领。总起来说，十九路军在福建环境复杂，打不开局面，又遭到南京当局的歧视，有自生自灭的危险，这当然是十九路军上层领导人

十分忧虑的事。十九路军领导人对陈铭枢回国、打开一个新局面是抱有很大希望的。

但是，陈铭枢旅欧归来后，采取了激进的政治主张，告诉他们准备联合各党各派反蒋，迅速组织独立政府，这使蒋、蔡一时接受不了。在抗日问题上，他们意见一致，都反对妥协退让，蒋光鼐、蔡廷锴还在长城抗战期间，派张炎、谭启秀率部北上支援，因长城抗战很快失败，而中途返回。对于《塘沽协定》，蒋、蔡曾联名发表措辞强烈的通电，表示反对。在反蒋的问题上，他们也是同意的，蒋介石对十九路军的歧视和阴谋，使他们对蒋介石非常不满。但对立即动员起兵反蒋的问题，蒋光鼐、蔡廷锴心存疑虑，力主慎重。他们本想迎陈回国，增强凝聚力，稳扎稳打，徐图行动，而陈铭枢则急于付诸行动，如果两广不干，也要十九路军在福建单干。蒋、蔡都劝陈：“当前不应公开反蒋，只有维持现状，搞半独立来聚积力量，联络四方，训练干部，等待时机，有了充分准备再干。”<sup>[4]</sup>他们还举出了这样做的理由，军事上兵力单薄，福建贫困，军饷全靠南京与广东两处接济，一旦南京或广东断绝接济，军饷就大成问题。但陈铭枢坚持自己的主张，对蒋、蔡说：“孙中山先生革命时代，手无寸铁，尚能成功，且革命不能计成败。”蔡廷锴答以：“成功失败，本不足计。但如何做起，此乃大问题。”陈铭枢表示准备与各党各派组织民主联合政府，但未能说服蒋、蔡两人，蒋、蔡还是认为“现在时间未到，尚须忍耐”，“凡事先有把握而后动，较为有利。”<sup>[5]</sup>

这是一个民国历史上常见的矛盾，一个不是实际掌握军事、政治实权的派系领袖，或者已经下野的派系领袖，他们在进行政治决策的时候，更多地倾向于不计成败地进行冒险。而握有军政实权的部属，从实际利害权衡，则宁愿维持既有局面，对未来利益存有希望，不到绝望之时，不愿轻于一博，丧失眼前看得见的权利。就十九路军来说，陈铭枢自担任广东省主席之后，对军队的实际指挥权早已放松，多年来形成了陈铭枢主政治、蒋光鼐主运筹、蔡廷锴主督战的局面，由蔡更多地负责实际指挥。蒋、蔡两师从广东出发，参加蒋介石指挥的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不但不让十九路军扩大编制，反而架构重叠的指挥机构（同是一军，竟设总指挥和军长两职），在十九路军内部制造人事矛盾。淞沪抗战，蔡廷锴战功卓著，在国内外舆论界声望雀起，甚至超过了陈、蒋。蒋介石既把陈铭枢排挤出中枢决策机构，又削去了陈铭枢的兵权，更趁势抬蔡贬蒋，让蔡来一手掌握十九路军。蔡廷锴独当一面，自然就要考虑自己和部队的发展和利益，何况，蒋介石还挟中央的名义以号令天下，陈铭枢再要指挥这支军队，就不可能如他希望的那样顺利了。而且，陈铭枢在广东省政府主席任内，就倾向于扶植民族资本，经营神州国光社之后，不断地和一些倾向民主、热爱祖国、追求进步的文化人接触，政治境界有很大提高。而蒋光鼐对政治不太感兴趣，蔡廷锴更是一位行伍出身的军人，在思想上和陈铭枢有一定的距离，在时局转折关头，政治上的敏感性较弱一点。

陈铭枢到达福建后，就深入部队作政治动员，力图把十九路军纳入自己希望的政治轨道，供自己驱策。蔡廷锴既已掌握军权，独当一面，对陈铭枢象一个婆婆一样重新回来管

事，难免有所不满。他在自传中说：“我见情形如此，亦以十九路军乃民族之军队不是私人军队，坦白地向蒋主席（指蒋光鼐——引者）请示，他说：‘我们现在只有维持现状，现在时间未到，尚须忍耐。’蒋主席既有主意，我亦领会。”<sup>[6]</sup>蔡在解放后发表的回忆录中，更直指陈“长时期以家长自居，把军队看作私人资本，领袖欲强，野心勃勃地不体念官兵牺牲奋斗的艰难，多疑善变，遇事投机，总想侥幸作孤注一掷……我和他联袂到闽，他即以太上自居，办事专断，不按手续，不择手段，不顾我的威信。”<sup>[7]</sup>其实，这在当时国民党军队中，是常见的作风，蔡文作于反右之后，批判比较严厉，不足深论。陈、蒋、蔡之间的矛盾，既成历史定局，虽有个人因素，也有难以避免的复杂的社会背景，没有什么是非曲直值得深入探讨。世界本来就是复杂的，没有那么多的是非分明。陈铭枢的政治决策既一时难以为蒋、蔡所接受，他不能不稍作等待，但仍独断地要把他的政治图谋付诸实施。

6月8日，陈铭枢偕同蒋光鼐第二次前往广州，参加西南政务委员会谈话会，再次做陈济棠的工作，并与李宗仁等一起讨论粤桂闽三省一起行动的问题。陈济棠“仍主张审慎，不欲改变一向之闪烁态度，所谓审慎者，以须征询所部各将领同一之意见为言。”<sup>[8]</sup>陈济棠当时掌握着实际决定权，多数委员都要看他的眼色行事。陈既消极，大家也就认为问题重大，要从长计议，发动倒蒋仍然需要等待时机。当晚，陈铭枢和蒋光鼐住在广州东山蔡廷锴的寓所里，李宗仁、陈济棠、邹鲁、萧佛成前来回访。陈铭枢再次同他们分析了国内形势和反蒋的必要性，但谈得很不投机。陈铭枢不客气地强调：“如果诸位不干，十九路军也要在福建干，到那时，只希望你们不要在我后门捣乱。”<sup>[9]</sup>陈济棠当即拂袖而去。第二天，陈济棠邀陈铭枢、蒋光鼐等到他的梅花村公馆去，希望能恢复会谈。但陈铭枢觉得昨天双方见解相距甚远，无法合作，因而不愿意继续和他周旋，一个人先行回港。

陈铭枢到广州后，曾和胡汉民的亲信邹鲁、邓泽如、萧佛成等晤谈，回到香港后即去拜访了胡汉民，表示拥护胡汉民出来领导。胡作为国民党元老，受到各界的尊重，是两广当局的精神领袖。胡被蒋扣留过，与蒋的矛盾很深，回广东后，依赖陈济棠，但也不能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陈铭枢对胡抱有很大的希望。但胡已年老，又不掌握军政实权，在这类问题上说话缺乏力量，如同蔡廷锴所说：胡汉民“虽高唱抗日之调，但无实际之行动，缘他非拥有实力，虽有任何好主张，亦属空谈，无补实际。”<sup>[10]</sup>既然陈济棠不积极，胡汉民不能不顾及陈济棠的态度，因而对陈铭枢的主张不肯轻易表态。陈铭枢在香港和李济深谈得很合拍，李对陈的方案完全支持，并劝陈铭枢再去和胡汉民谈谈。陈向胡提出，只要求他到福建去，并与桂系一致行动，胡终于采纳了这种进退两全的办法。这样，陈铭枢在广东碰了壁，联络计划进展很不顺利。

## 二、联络各方

陈铭枢到香港以后，曾邀约梅龚彬到香港来长谈。梅是中共党员，陈对他很信任。陈把自己的计划全部告诉了他：

一、争取与陈济棠合作，利用当时业已形成的粤、桂、闽三省联盟，以西南执委会与

执行部两机构为基础，拥护胡汉民与陈济棠，以福建及十九路军为核心，建立新的政党，联合共产党，发动民众，实现业已酝酿很久的政治路线。这是上策。

二、陈济棠如不愿意干，就请胡汉民与李宗仁合作，要求他们出兵威胁湖南，等我们干起来，陈最后也会跟我们走。此为中策。（按：《梅龚彬回忆录》说，“先搞闽桂联合倒陈，再发动反蒋”，这一说也不无可能——引者）

三、如胡汉民还不愿干，就请李济深出来领导，哪怕仅有十九路军，也要孤军奋战到底。这当然是下策。<sup>[11]</sup>（按：梅说的下策是“争取与红军合作反蒋”——引者）

梅龚彬见陈铭枢把自己的最机密的计划告诉了他，也就直言相告说：“红军是咫尺近邻，时间那么紧迫，无论粤桂参加与否，都应首先考虑联合红军。”陈铭枢对梅的意见表示完全赞同。陈铭枢广东之行不顺利，就下决心找中共商谈十九路军与红军联合对蒋介石作战问题。陈、梅商定之后，就同去向李济深请示，李完全赞同他们的方案，随即派出朱蕴山到上海与中共联络。

李济深是陈铭枢的老上级，李自一度为蒋介石扣押后，与蒋的关系已经破裂，有反蒋的思想基础。陈铭枢虽然和李的关系一直不太好，但在反蒋的大局之下，两人有了重新合作的基础。“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李、陈之间就恢复了交往，对许多问题看法一致。陈铭枢出国后，李济深南下香港，希望能在两广运动旧部，另谋发展。但羽毛丰满的陈济棠，对这个提拔他的老上司态度冷淡，唯恐李的活动于己不利，不仅拒绝了李提出的每月给5万反蒋活动经费的要求，而且放出风来，广东军人要算当年李主政时的军饷、公积金旧帐。在此情况下，李济深不便去广州，只好回家乡梧州闲居。陈铭枢回香港后，立即与李济深联系，得到李的支持。考虑到李在国民党内原先的地位与声望以及在两广的影响，陈铭枢推他作为这次反蒋运动的领袖。7月17日，李济深与陈铭枢联名致电汪精卫、孙科、居正、于右任，就国民党派兵镇压察哈尔抗日同盟军一事，表示：“国家多难至此，应共奋同仇敌忾之心，勿轻启兄弟阋墙之祸，为外人所笑、千古所悲。乞我公主持至计，即飭令停止入察之师，为国家惜人材，为社会留元气。”<sup>[12]</sup>这是李、陈两人多年来首次联名通电，从而表明两人在政治上已经重新合作。

现在，关键的问题是陈铭枢能不能把十九路军真正发动起来。尽管陈铭枢与蒋光鼐、蔡廷锴在反蒋做法上有些分歧，但在反蒋大目标上还是一致的，因此，陈以为十九路军是自己的旧部，听从自己的主张，发动其反蒋很有把握，蒋、蔡一时的不同意见并未动摇他立即发动反蒋的决心，但也因此对十九路军内部的复杂情况漫不经心。他首先着重做了蒋光鼐的工作。陈、蒋的个人关系和历史渊源更为密切，他们本是朋友，而蔡则一直是陈的部将。而且，蒋处事随和，顾全大局。6月间陈赴广州时，特意偕蒋光鼐同行，两人在港、穗之间逗留了近一个月，他有充足的时间说服蒋同意他的看法。蒋的地位居于陈、蔡之间，大凡陈、蔡有什么意见，他一般都不会坚决反对。在陈未回国前，蒋更多地迁就蔡，陈既回国，他自多尊重陈。经陈的说服，他便不再坚持己见，接受了陈铭枢与各党派联合组织

民主政府，推李济深出来主持反蒋抗日大计的主张。7月，陈铭枢和蒋光鼐一起再次到福建进行动员。蒋光鼐回头劝蔡廷锴：“我们时机到了。我们要实行抗日，但要抗日，非革命不可。南京政府既不能领导我们抗日，中华民族解放无期，中华民族必沦为日本的殖民地，万劫不复。我今已答应真公了。”<sup>[13]</sup>同时，蒋还向蔡力陈利害：“非同心协力不可，十九路军靠两广不成，不打起反蒋旗子，也终为蒋介石收买利用，自行瓦解。我们军力、财力虽不足，但孙中山手无寸铁也敢干。”<sup>[14]</sup>陈铭枢与蒋光鼐都是蔡廷锴的老上级，他们既已一致，蔡自然也就只有顾全大局了，他一度想挂印逃官，也经蒋光鼐力劝打消。同时，当时的局势对蔡廷锴也有极大的压力，迫使他不能不铤而走险。即蒋介石计划的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即将开始，十九路军虽然一直避免与红军交手，但在这样的形势下，势必不得被迫出战，为蒋介石火中取栗，在内战中损耗自己的力量。而且，红军已于7月间攻击闽北，先后占领清流、朋口、连城等地，区寿年的七十八师损失两个团，十九路军上下震动。事实说明，十九路军如不服从蒋介石的命令，不愿“剿共”，必为蒋介石所消灭；如服从蒋介石的命令，官兵不愿打，孤军深入，后无援兵，也必为红军所消灭。蔡廷锴感到如此下去，十九路军“剿”也败，不“剿”也败，前途堪忧，压力沉重，不如随从陈铭枢，另立旗帜，或许能打开一个新局面。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三人经一度分歧之后，终于在反蒋抗日问题上达成了共识。陈铭枢的坚持和努力，对推动福建人民政府的产生起了关键的作用，他无异是最重要的发起人与领导人。当然，陈铭枢粗疏的性格，对事件的进程是有不良影响的，但局势的迫促，恐怕是更重要的原因。

陈铭枢在福建和蒋、蔡取得一致意见之后，即回到香港，紧张地与各方面取得进一步的联系，筹划建立反蒋抗日的政府。李济深和陈铭枢考虑到参加反蒋的实力派太少，十九路军在福建有孤军作战的危险，仍然希望争取广西方面一致行动。以广西的实力和影响，如能和福建方面一起行动，成功的把握当然要大一些。他和李济深派出了尹时中专程去广西，与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商谈起事计划。李济深、陈铭枢提出，政纲内容除“计口授田”已定外，其它均可从容讨论。起事后，福建出兵浙江，广西出兵湖南。李宗仁、白崇禧都是非常精明的一方领袖，他们和蒋介石已经打了多年交道，早就领教过蒋的手段，屡次反蒋受挫，因而对是否参加李、陈领头的反蒋运动，不免要再三权衡利弊，采取了十分谨慎的态度。反蒋派之间难以一致，他们是很清楚的。李宗仁主张拉上陈济棠一块干，如果广东参加，广西绝无问题，不然的话，也可以等蒋介石对十九路军主动动手的时候，再和西南联合起来一致行动。这当然和李济深、陈铭枢先发制人、立即行动的主张不合拍。实际上，李宗仁等已经了解到十九路军内部对起事也有不同看法，十九路军与中共的关系也还需要时间去处理，而且，他们对陈铭枢联共的激进措施也不赞成，因而基本上采取了旁观的态度。

陈铭枢还在国民党系统的军政界进行了广泛的联系。他找了陈友仁、徐谦等在政界有影响的人士商谈。徐谦当即赞成陈的主张，而陈友仁则众所周知不谙中文，陈铭枢与这位

中国著名的外交家谈话还要找贴心的翻译，谈了3次，陈友仁也同意参加。为了扩大力量，李济深，陈铭枢还分头与湖南的何键、贵州的王家烈、云南的龙云、四川的刘湘、山东的韩复榘、陕西的杨虎城等实权派，冯玉祥、方振武、李烈钧、方鼎英等在野派联系，结果，在野派多表示支持，而实权派则多主慎重，在以后的事变中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

邓演达遗留下的第三党，则是陈铭枢在发动反蒋运动时的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由于邓演达与陈铭枢的关系，第三党的领导人黄琪翔、章伯钧、彭泽湘等人与陈多有来往。1933年春，第三党已经派出一些党员到福建工作，为十九路军举办各种训练班。9月间，第三党领导人黄琪翔、章伯钧、麦朝枢等应李济深和陈铭枢的邀请，到达香港，会商组织革命政府事宜，他们明确表示支持反蒋运动。陈铭枢创办的神州国光社的文化界人士，王礼锡、梅龚彬、胡秋原等人与陈铭枢关系密切，经常为他出谋划策，为他的政治主张提供理论依据。神州国光社由于出版左翼书籍，热烈支持“一·二八”抗战，因而受到当局的破坏和压制。陈出国前与王礼锡、梅龚彬见面，已透露了自己的反蒋意图。在陈出国期间，梅龚彬曾去福建为十九路军干训班讲课，进行思想动员。陈回国后，这批人陆续应邀到达香港，参与行动计划，成为后来福建人民政府的骨干。

当时，十九路军在闽西与红军处于对峙状态，时有战斗。因此，十九路军要在福建起兵反蒋，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是与中共和红军的关系。如果十九路军和红军不能建立反蒋的联盟，那末，十九路军势必陷于两面作战的危险境地，那就必败无疑了。陈铭枢还在欧洲的时候，就考虑了和中共的合作问题，因而回国后，一开始就着手沟通与中共的联系。

还在淞沪抗战期间，中共就已和十九路军建立了某种联系。中共在上海地下组织的负责人潘汉年安排秘密党员梅龚彬做陈铭枢的工作，陈铭枢也曾通过左翼作家丘东平向周扬转达十九路军的意图。十九路军调福建前，梅龚彬又安排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会见潘汉年，为双方以后的合作留下了一条联络的通道。陈铭枢回国后与中共的联络工作，首先是由谭平山向他推荐的朱蕴山进行的。朱去上海见到了胡鄂公，但没有得到结果。陈铭枢又续派梅龚彬去上海，梅先想找党内联系人张庆孚，但没有找到，只找到胡鄂公。不久，胡被国民党逮捕，联系中断。这时中共中央绝大部分领导人已去了江西苏区，上海地下党在国民党追捕下处境困难，即使能在上海和中共负责人联系上，恐怕也难以作出决断。但当时陈铭枢并不知道这些情况。与中共的联系不顺利，十九路军与红军在前线时有交火，尤其是7月底，十九路军在闽北损兵折将，引起官兵疑问：“不是说我们已同共产党合作了吗？为什么又打起我们来了呢？”蔡廷锴当面对陈铭枢说：“你同共党接洽，已有数月之久，如果他有心合作，何以他又犯我连城、闽北等处？如此情形，还有合作可能吗？”陈铭枢只得回答说：“此乃共党实力派的错误。而且我们还未有和他们合作成功，当然不会停止敌对行为的。”<sup>[15]</sup>实际上，陈铭枢自己也不免心存疑惑，误以为中共不愿和他合作。他对梅龚彬说：“我们要求合作是有诚意的，若果共产党不同我们合作，将来是要受历史裁判的。”<sup>[16]</sup>他见两次派人去上海都无结果，便写信交陈公培带往福建，与蔡廷锴相商，

争取在前线与红军直接联系。

陈公培自香港到福州，与蒋光鼐、蔡廷锴商量后，带上写在绸子上的密信，化装成农民，由蔡廷锴派人送到前线。几经周折，终于在9月间与红军接上头。红军东方军总指挥彭德怀在延平西南的王台会见了陈公培。陈转达了十九路军愿与红军停战、共同抗日的愿望，彭表示欢迎，并请陈转告十九路军，抗日必先反蒋，停止“剿共”，停止内战，并欢迎派代表去瑞金与中共中央直接谈判。

陈铭枢在香港得知与中共的联系已经沟通的消息，非常高兴，不意两次去上海未能接上的关系，却在前线打开。10月6日，陈铭枢由香港秘密到达福建，与蒋光鼐、蔡廷锴商量具体进行办法。因为陈公培与十九路军的关系不深，蒋、蔡提议派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领头，偕陈公培等前往瑞金。10月上旬，徐名鸿一行从龙岩出发到达瑞金，与中共中央负责人谈判。朱德、毛泽东会见了徐名鸿一行，向他们表示赞同红军和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上进行合作。10月26日，中共代表潘健行（汉年）与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签订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

双方签订的协定共11条，规定：十九路军与福建省政府和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为挽救中华民族之垂亡，反对帝国主义殖民地化中国之阴谋，并实现苏维埃政府及红军屡次宣言，准备进行反日反蒋的军事同盟”。协定主要内容为：1、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暂时划定军事疆界线，各在该线不得布置主力部队；2、双方恢复输入之商品贸易，并采取互助合作原则；3、福建省政府及十九路军方面立即释放在福建各牢狱中的政治犯；4、福建方面赞同福建境内革命的一切组织之活动，并允许出版、言论、结社、集会、罢工之自由；5、福建方面根据本协定原则发表反蒋宣言，并立即进行反日反蒋军事行动之准备；6、双方互派全权代表互驻；7、双方另定反日反蒋具体作战协定及商业条约。<sup>[17]</sup>

十九路军与中共签订的协定，解除了他们在将来举事时两面作战的危险，也使红军可以腾出力量来对付蒋介石的“围剿”，对双方都是有利的。但是这个协定并未完全达到十九路军与陈铭枢最初的愿望，他们本想与中共达成具体的反蒋作战同盟计划，互相支持，但这个计划没有被中共方面所接受，而是被搁置到将来再考虑，这使他们多少有些失望。他们并不完全了解中共内部的情况，当时中共正处在“左”倾路线统治之下，“左”倾领导人无视客观形势的变化，从教条主义立场出发，认为中间派有迷惑性，是最危险的敌人。因此，他们更多地将与十九路军的谈判视为权宜之计，在谈判中只关心闽西划界等问题，想多占实利，缺少对十九路军的有力支持，甚至还怀疑这是对方为“求得一时缓和，等待援兵之狡计”。这样做的结果，使中共和十九路军都丧失了一个打开局面的很好机会。

在几个月的时间中，陈铭枢广为联络各方反蒋力量，虽争取到不少人的支持，但真正有军事力量和群众基础的人为数不多，而蒋介石也在力图打消陈铭枢的计划。陈铭枢回国后的动向一直在蒋介石的注意之中。他刚刚到达香港，蒋介石、汪精卫就来电邀他到南京

任职，为陈婉言拒绝。此后，蒋的说客不断登门拜访，劝陈与蒋合作，力图打消他的反蒋谋划。6月14日，黄绍竑衔命南下广州，向西南当局解释华北停战一事，并与李济深、陈铭枢接触。黄原为桂系大将，后因个人关系疏远了李宗仁、白崇禧，靠近蒋介石，但李、白、黄之间的私人关系并未决裂。他与李济深、陈铭枢都是老熟人，李、陈对他并不抱多少戒心，反与他谈得较深，想把他拉过来，或在南京做点内应工作。陈铭枢记得三人还搞了个约书，记录下共同的政治主张。曾有人说黄回京后向蒋报告了闽方的计划，陈铭枢认为此事不可靠，黄为了复命，可能谈些见闻，但不至于涉及机密。继之而来韵说客是段锡朋。陈铭枢在南京任总政治部副主任时，段是组织处长，与陈关系不错。6月23日，段锡朋到港，动员陈进京。陈铭枢此时对段已有戒心，见面时只谈自己的政治见解与蒋介石确有分歧，谢绝进京之邀，但闭口不谈具体行动计划。段锡朋空手而归。10月14日，蒋介石与汪精卫在庐山会商闽局。21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离京赴闽，对外声称是返里扫墓，实则是劝陈放弃举事计划，到中央供职。林与陈私交甚笃，林出任国府主席还是陈的推荐。但陈铭枢穿梭往返于闽、港之间，避而不见林森。直到11月11日，在一切布置既定的情况下，陈铭枢、蒋光鼐才对已在福州住了大半个月的林森作了礼节性拜访。双方话不投机，林森不得要领而返。当时，蒋介石在福建布置的特务如云，耳目众多。省府委员高登艇、郑贞文、林知渊、孙希文等都是蒋派来的耳目，当然不赞成反蒋。十九路军参谋处长范汉杰本是蒋的黄埔门生，宋子文派有亲信陆文澜到福州坐镇。通过他们，蒋介石基本掌握着福建的动态，并进行分化、收买的活动。

陈铭枢在福建布置好与红军的联络事宜后，即于10月19日回到香港，进行最后的发动工作。蒋光鼐也以与子完婚为名，到达香港。陈、蒋与李济深、徐谦、黄琪翔、章伯钧以及冯玉祥代表余心清等人在李济深家中会商赴福州组织反蒋抗日的人民革命政府问题。有人主张不要用人民革命的称谓，以便聚集反蒋力量；有人主张先从改造军队和革新福建政治做起，作长期打算；也有人支持陈铭枢，认为各党派联合阵线有号召力，通电一出蒋介石就会下野，不必顾虑。陈铭枢则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不能有所迟误。蒋光鼐“看到陈铭枢草率行事，急急发难，作孤注一掷的样子，颇为担心”，<sup>[18]</sup>没有发表什么意见。陈铭枢是举事的最有力支柱，他的意见主导着会议的趋向。会议最后匆匆决定，在香港参加政府人员分批陆续到福州筹备举事。

10月31日，陈铭枢从香港专程赶到漳州，向蔡廷锴传达香港会议精神，告诉他准备月内发动事变，随后又回到香港进行部署。11月中旬各路人马陆续到达福州。蔡廷锴在事前对军事已有所布置，一方面准备扩军，一方面收编民军，这时遂召集高级军官举行军事会议，进行动员。9月间，蔡廷锴曾在漳州召集过一次军官会议，布置反蒋，征求意见，但这些军官“均无政治头脑，心里纵有不满，亦不敢吐露半点，也不表示任何意见”。<sup>[19]</sup>在这次会议上，蔡廷锴宣布十九路军要革命，反蒋抗日，改称人民革命军，希望各将领响应。但会议开得死气沉沉。在高级军官中，沈光汉、区寿年、谭启秀与蔡廷锴是同乡，关

系不错，比较服从指挥，表示要回去传达作准备，认为军人对命令当然要服从。毛维寿、黄强、张炎、邓世增等人面带笑容不开口，对同红军和平相处，对反对南京政府之事一无表示。晚到的十九路军老将戴戟对反蒋也不积极，影响到毛维寿等人。事实上，毛、张等已同蒋介石系统拉上了关系，态度暧昧。军队内部状况如此，一时难以扭转。因此，十九路军缺乏同仇敌忾的反蒋气氛，让蔡廷锴很感苦恼，从而使蔡再次犹豫起来，决意建议陈铭枢暂缓进行。

11月9日，陈铭枢、蒋光鼐自香港到达厦门，开始了举事的最后准备。18日，李济深、陈友仁、徐谦、黄琪翔等到达福州。当日，在陈铭枢提议下，在福州鼓山召开紧急会议，讨论反蒋的政纲、政策及人民政府成立的时间问题。当时，陈铭枢看到蒋介石曾两次派飞机来接蔡廷锴，怕蔡发生变化，强调组织政府的人员已集中，各方代表已将到齐，时间迫切，刻不容缓。他认为发难之后，各地必然响应，蒋介石的军队在江西抽不出来，即使来10个师，十九路军一个师可以击败敌人两个师，加上红军的沿途阻击，就有战胜希望。蔡廷锴不赞成11月间发动，力主再等一两个月再说，理由是蒋介石一定动武，而十九路军联络了红军，已无与两广和平相处的希望，又有军事、财政诸多困难，内部不稳。蔡的意见引起会议七嘴八舌，议论纷纷，争论了很长一段时间。但陈铭枢坚持认为：“即使失败了，我们是抗日反蒋的，失败也是光荣。”最后，陈铭枢强硬表示，豁出去拚命了，革命就不怕牺牲，如再拖下去，不同意立刻通电的话，那就把我们这些人送南京立功去。在陈铭枢力排众议、强烈坚持下，蔡廷锴“当时压制感情，不予争辩，认为事已至此，为顾全团体，明知败亡，只可同意提前发难”。最后，鼓山会议决定20日举事。

蔡廷锴对陈铭枢的蛮干是不满的，在私人感情上两人之间也有隔阂。他后来回顾说，“在闽变酝酿过程中，不是蒋（光鼐）从中调解就搞不起来。”<sup>[20]</sup>蒋光鼐私下里对陈也不无抱怨，事后就曾对人说：“我有什么办法？我们要不干，真如就要自杀。横竖十九路军是真如的家当，他要拆散了，我们也只好由他。”<sup>[21]</sup>其实，陈、蔡的分歧，反映了他们在目标和力量之间的一种两难选择，蔡提出的一系列问题，事实上无法改善，以十九路军的处境，如推迟发动，也不免为蒋介石所分化瓦解，陈铭枢的蛮干，也是情势所迫。当时，蒋光鼐在了解了十九路军将校的内部动向后也曾慨叹：内部如此不纯洁统一，举义革命哪有不失败的。但蒋光鼐更能顾全陈铭枢的领袖地位，尊重他的选择。当时部队的素质就是如此，尽管蔡廷锴说什么十九路军是民族的军队，但军队的私人宗派关系事实上十分重要，形成不同的军队系统，没有这样的关系，一个职业军人，要想在军队中站稳脚跟是困难的，这也就是当时的军人常说的团体精神。蔡廷锴是在十九路军的系统中成长起来的，三人之间虽然发生了一些矛盾，但在关键的时候，仍能团结合作，成为福建事变得以发动的重要基石。

在福建人民政府行将成立之际，蒋介石亲自出马，极尽利诱、分化、威胁之能事，力图将其消弭于无形。他曾函电劝蒋光鼐，“以昔日战功为重，勿听信他人，误入歧途”。<sup>[22]</sup>

他对手握兵符的蔡廷锴尤为重视，一再向蔡查询陈铭枢来闽活动的情况，并派飞机来福州，接蔡去庐山面谈。蔡托病拒绝，蒋又几次电催。蔡为了了解蒋介石的企图，就派了十九路军驻京办事处主任黄和春前往庐山见蒋。蒋召见黄后，即令宋子文送蔡50万元交黄带回。11月上旬，蒋介石通过陆文澜要黄和春再去庐山，黄请示蔡廷锴后予以拒绝。中旬，蒋介石几次与蔡廷锴通电话，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前两日，蒋介石又派飞机携函来接蔡廷锴往南昌会晤。蒋的亲笔函称：“闻兄受西南政客包围，意存叛变，有则消弭之，如无，则请明日乘派来之飞机来京。”<sup>[23]</sup>蒋光鼐力劝蔡廷锴不要自投罗网，蔡随即将飞机及飞机师扣留，拒绝了蒋介石的拉拢。

蒋介石为阻止福建举事，最后直接向陈铭枢摊牌。他在福建举事前夕，两次给陈去电，由蒋光鼐译转，劝陈勿受他人挑拨离间，为一时误会所隔阂；阐述今日中国非剿共不足以抗日，非先安内即无力御外，希望和衷共济，一本六七年来同甘苦、共患难的宿望，盼即到南京中枢共负国家大事云云。11月19日，陈铭枢回电蒋介石严正表示：“来电所言，决非他人挑拨所能离间，亦非一时误会所能隔阂。某因爱公，然亦爱国家，所见不同，自唯有各行其是。公对外对内政策，当世自有公评，千秋当有定论，某勿容置言。然于匹夫有责之义，乃不敢以私害公。细读来电，似公于年来政策，乃极坚持，毫无悔意，某深为失望。……公试于清夜三思，年来所为，果何有于民族？果何有于民生？能不废然思返乎？公又云，根本救济，即在牺牲成见云云，某不特无成见，且不信妥协即有利于国家。盖中国乃四万万人民之国家，非少数人之私产，少数人以和平争权，统一夺利，固毫无济于民族生存也。公自信有谋国之忠诚，何不于国人共怒之前，自决其进退乎？”<sup>[24]</sup>至此，福建事变如箭在弦上，势在必发。

### 三、易帜革命

经过秘密紧张的筹备，1933年10月20日，福建人民政府匆匆打拉了帷幕。这一天，福州全城洋溢着一派新的气氛，大小街道遍贴“打倒帝国主义”、“打倒蒋介石”、“打倒南京卖国政府”、“打倒国民党”、“实行工农解放”等标语，扑面而来行人眼帘。当日上午，机关休息，学校放假，商店停业，经过动员，各界群众数万人齐集南门公共体育场。上午9时许，中国各省人民临时代表大会宣布开会，来自全国各省的代表百余人是这次大会的正式代表，他们多为各地反蒋派人士。出席大会的领袖人物，有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陈友仁、徐谦、黄琪翔、章伯钧、戴戟、李章达、梅龚彬、余心清、胡秋原等。黄琪翔被推为大会主席团主席，报告开会的宗旨：“站在革命的立场，来共谋如何拯救中国危亡”，“我们应以加倍奋勇的精神，努力迈进，完成革命的要求”。<sup>[25]</sup>其后，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陈友仁、陈铭枢、徐谦等都相继发表演说，一致主张打倒蒋介石、南京政府及国民党，建立人民革命政府，保障人民权利，实行农工解放。演说完毕，即提出提案，发表人民权利宣言，组织人民革命政府，改用上红下蓝中嵌黄色五角星形之国旗，经全场民众一致举手通过，当即举行了升旗仪式，随后整队出发游行。

20日晚，大会主席团根据会议决议，着手组织政府，推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11人为人民革命政府中央委员。22日上午，人民革命政府举行成立典礼，李济深主持中央委员会会议，决定更定年号为中华共和国元年，赦免政治犯，选定了政府成员：李济深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冯玉祥为经济委员会主席（余心清暂代），陈铭枢兼文化委员会主席，戴戟为军委会参谋团主任（黄琪翔暂代），陈友仁为外交部长，蒋光鼐为财政部长，彭泽湘为秘书长，徐谦为最高法院院长，李章达为政治保卫局局长，何公敢为福建省省长。24日，各部会长官宣誓就职。政府组织大纲规定：“人民革命政府受全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之付托，执行中华共和国最高权力”；“统率海陆空军，并领导一切武装人民”；“以会议方式处理国务”。<sup>[26]</sup>

这一场改元易帜的革命，是在陈铭枢一手策动下进行的，十九路军和在当地活动的第三党势力，是这场革命的主要支柱。这场革命是秘密策动的，没有群众的普遍动员，外来的各军政界人士，在当地也缺乏社会基础。陈铭枢虽然一手设计着党政军的一切，但他并没有过份出头露面，更多的是在幕后活动，调节着政府内部复杂的人事关系。他担任了政府的中央委员，兼任文化委员会主席，同时还兼任了军事委员会委员。27日，陈铭枢又担任了军委政治部主任的职务。这是一个敏感的问题。李济深名义上是军委会主席，但事实上不可能去行使对军队的指挥权。十九路军在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改称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蔡廷锴任总司令，邓世增任参谋长，蔡负责着军队的实际指挥。陈铭枢作为十九路军的创始人，人民革命政府的实际策划者，他力图保持对军队的控制权，因此，出任了政治部主任的职务。在军事力量没有扩大的情况下，这样势必就削弱了蔡廷锴原有的对军队的指挥权，改变了既有的指挥关系，因而引起了十九路军部分将领的不满。军权问题是一个最敏感的问题，对以后的作战带来许多矛盾。

还在人民政府成立以前，在陈铭枢主持下，由团结在陈铭枢周围的一批文化界人士，如王礼锡、胡秋原、梅羹彬等起草了一系列政治文件，向各界宣布人民政府的政治纲领与政策，其中主要有：《人民权利宣言》、《人民政纲》、《人民革命政府对内通电》、《人民革命政府对外宣言》等。这使这场事变成为有理论指导的、有革命意义的事件。

《人民权利宣言》是11月20日临时人民代表大会通过的。宣言声明，“中国为中华全国生产的人民之民主共和国”，“中国国家之独立，为不可侵犯之最高原则”，“全国人民不论种族、性别及职业，除背叛民族、剥削农工者外，有绝对之自由平等权”。宣言提出，“为排除帝国主义在中国势力，打倒军阀，铲除封建残余制度，发展人民经济，实现彻底的民主政权起见”，应实行如下措施：否认一切不平等条约，实行计口授田，发展民族资本，奖励工业建设，人民有身体、居住、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信仰、示威、罢工之自由。宣言宣布，否认南京反动政府，召集全国生产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宪法，解决国是。<sup>[27]</sup>

在政治制度上，福建人民政府规定实行新省县制度，召开乡生产人民大会，选举乡人民政府，再循序产生区、县、省政府，最后召开全国生产人民代表大会，制订联邦宪法，

产生联邦政府。

在经济体制上，要求“维护民族资本，奖励建设，对于民营工商一切事业，绝对尊重固有权利，并加以保护，而助其发展”。<sup>[28]</sup>在土地问题上，十九路军曾在闽西实行计口授田，事变后决定扩大到全省，原则是耕者有其田，土地国有，农民享有使用权及收益权。方法是农民不分性别、年龄，一律平等分配土地，由授田委员会进行。《计口授田宣传纲要》认为，这种做法既可以实现耕者有其田，又可以避免中共土改的暴力方式，使乡村得到真正的发展与和平。

关于外交政策，人民政府对外宣言谴责蒋介石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同时，也反对亲美亲国联派，“认定中国真正的权力必须树立于民族基础上，而此以人民革命政府为工具之新运动的领导权，乃为‘中国的’也”。宣言强调：“吾人最后声明推翻蒋氏政权，不特为中国独立与救亡所必需，且为全世界军事与经济之利益计，亦为必要。倘日本帝国主义者得蒋氏之协助，得以完全统治中国之富源与人力，则世界大战不可免，而在世界之一部分之日本，其国家之生存，亦岌岌可危。”<sup>[29]</sup>在外交政策的实施中，要求取消不平等条约，废除领事裁判权，并决定撤废厦门鼓浪屿会审公廨。

福建人民政府的一系列纲领和政策，说明它是一个主张维护民族独立、实行政治民主、发展民族经济的政府。当然，它还不能接受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领导，但它的基本主张，是符合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历史要求的。因此，它能和中共建立起政治和军事的同盟关系。早在淞沪抗战的时候，王礼锡就提出过“市民抗日政府”的主张，陈铭枢深受王的政治主张的影响。据何公敢回忆，举事前，何公敢与林植夫到香港看望陈铭枢，见陈书桌上放着河上肇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陈问何：“将来举事，标榜马列主义，何如？”<sup>[30]</sup>陈还要十九路军将领都读点有关马列的书。尽管陈理解的马列主义难免是肤浅的、皮毛的，但他的思想毕竟在变化，在他的所谓“生产人民”的理论中，毕竟吸收了一些左翼思想的成份，使他能够成为与中共结成同盟关系的国民党民主派的领导人。这种历史作用，在当时其他国民党将校中，是难以担当的。他在这样的思想基础上设计出自己的政治蓝图，在福建人民政府中付诸实践。它的意义，也就超出了一次单纯的军事政变的范围。

在福建事变期间，陈铭枢本人对这次革命的理论意义也作了阐述，他在《何谓人民革命》一文中说：

（一）人民革命是生产的人民革命。所谓生产的人民就是工人、农民、革命的小资产阶级、革命的武力，以及革命的华侨和革命的民族资产阶级。工农是直接生产的，商学兵是间接生产和保护生产的。所以人民革命既不是包括反生产的全体人民，也不是单纯的工人、单纯的农民或笼统的平民。

（二）人民革命是真正的民族革命，是彻底的民主革命。因为不生产的、反生产的帝国主义、买办、军阀、官僚、豪绅一定是反民族的，并且是维护封建残余制度的，而生产人民是民族的势力和民主的势力。

（三）人民革命是使中国经济进步的革命。现在中国在不生产和反生产的分子统治下，社会停止在落后状态，只有全国生产的人民的革命改造政权，实行工业化，才可以使中国成为一个真正的近代国家。

（四）人民革命是改造中国政治的革命。中国政治操于不生产、反生产势力之手，只有生产人民革命将他们打倒，才能建立生产人民的民主政治，才能根本肃清军阀政治。<sup>[31]</sup>

自1927年以来，国民党内部发生过许多次分裂，但陈铭枢指导的福建人民政府，在上述理论指导下，和以往国民党内部分裂的性质是不同的，这是一次主张民族民主革命的政治派系和国民党的分裂，表明了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扩大的广阔前景，因而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也因为这一点，福建人民政府在国民党内部空前地孤立无援，其他反蒋的军事派系，因为福建人民政府的上述政策，拒绝把原先支持它的承诺付诸实施。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陈铭枢主持文化委员会来从事宣传和群众工作，并在一些地方实行计口授田的试验。当然，由于福建人民政府存在的时间很短，很难作出什么成绩，但这是表明福建人民政府政治方向的行动。由于福建人民政府的革命性质，李章达坚决主张脱离国民党，并起草了通电。该电得到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陈友仁、徐谦等的签名同意，并于11月21日发表。通电称：“南京政府成立以来，整个国民党为蒋中正所把持操纵，于是蒋氏乃得肆行其残民卖国之手段，使我人民陷于悲惨凄惶之境”，宣布“谨以最光明之态度”脱离国民党党籍。<sup>[32]</sup>既已宣布脱党，陈铭枢感到应该有一个组织来领导这场运动。陈铭枢在事变期间的一次答记者问中说：“我们非有适应时代革命要求的正确政纲、树立光明严密的纪律，和一致努力、形成颠扑不破的‘法的领导’的政党，则不足以负起复兴国家民族和彻底解放农工生产大众，进而完成社会革命的大使命。”<sup>[33]</sup>循着这个思路，他用了不少精力去组建新党，也就是生产人民党。党的命名，则来源于他的前述理论。党的纲领，则是他委托文委会（秘书长为梅龚彬）中的人起草的。党的总纲草案规定：以工农兵为最基本的成份，秘密组织，树立严明的纪律，实行普遍的自我批评。最早签名参加的有陈铭枢等27人，据现有统计，党员人数不超过300人，成员主要是十九路军中上层军官，参加福建人民政府的文化界人士，反蒋的军政界领导人。陈铭枢为了以生产人民党为核心，来领导这场运动，要求第三党解散。于是，第三党以中国革命行动委员会名义，于12月11日发表声明，表示福建人民政府“所揭载革命之基本原则，建立生产人民政权为中心之中华共和国，直与本党素所主张之政治原则根本相同，而一切革命势力之汇合以增厚革命力量，又为本党历年之志愿”，因此，“本党之革命精神既有所寄托，已无单独成立组织之必要”，宣布解散原有组织，“一致参加生产人民革命运动”。<sup>[34]</sup>生产人民党也就接收了第三党原有的民众运动工作，生产人民党的骨干，就是文委会中的一批文化人。事实上，生产人民党的组织和党务活动没有来得及展开，只维持了一个空架子。而且，第三党由于不得不解散，对陈铭枢很不满，彭泽湘专门在李济深面前挑拨他和陈铭

枢的关系。神州国光社的文化人和第三党成员之间在党务活动上也时有摩擦。福建事变失败后，该党自然解体。

#### 四、独臂难支

福建事变的发生，蒋介石虽事先已有所知，但消息传来，还是感到了震动。他最担心的是各地响应，红军反攻，令他难于应付，因此终日彷徨，莫知所措，常常自言自语地说：“糟了！糟了！”蒋对陈在军队中的影响力不敢掉以轻心，对陈的联共举动也非常敏感，因此，他将迅速扑灭“闽变”作为头等大事而不惜一切代价。

11月20日，福建举事当晚，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开会，通电各省市府称：“陈铭枢等忽于此时，在福州纠合所谓第三党重要分子，自立名目，实行叛乱，同时勾结共匪，助其肆虐。并造作谣言，厚诬政府，以图惑淆视听。若任其猖獗，则荼毒生民，危害国家，为患不堪设想。为此决议，着各军政机关，迅予处置，务使叛乱克日救平。”<sup>[35]</sup>其后，国民党决定开除陈铭枢等人的党籍，并交政府严行拿办。国民政府对陈铭枢、李济深、蔡廷锴、蒋光鼐四人，以“背叛民国”罪，褫去本兼备职。

此时，蒋介石正在江西前线指挥对红军的第五次“围剿”，22日即以个人名义发布《告十九路军全体将士书》，着重攻击陈铭枢“联共叛党”，指责所谓“陈铭枢、李济深之徒”，“倡言联共，背叛中国国民党，反抗国民政府，组织其共产党化身之所谓生产党与所谓人民革命政府，废弃本党总理自革命以来所创造青天白日之党国旗，而揭其上蓝下红中嵌黄色五星之叛旗。值此国难严重之秋，全国并力剿共之日，乃竟有此危害党国自促灭亡之举，是诚何心，良难索解。”他以勋名相诱惑说：“我十九路军忠勇诸将士乎，昔以剿共抗日与不参加内战而获令誉者，今乃反为陈逆所挟持，致成破坏党国之戎首，其将何词以自解于国人之前，且将何以对总理在天之灵，何以见剿匪抗日诸先烈于地下乎……不应因一二人之反复而盲从附和，举已经出死入生所造之勋绩光荣，随之以毁灭。”又以“剿共”相号召：“现时中正（蒋介石自称——引者）认定国家当前唯一之急务，与唯一之生路，只有努力剿灭赤匪，方足以卫党国而救危亡。”他要十九路军将士“坚持剿匪之原有阵线”，“大义灭亲”，脱离陈铭枢。<sup>[36]</sup>23日又通电“剿共”前线将领，除对陈铭枢个人进行人身攻击外，把陈铭枢和中共联为一体，进行攻击：“盖闽变实共匪之最后挣扎，本为其破坏我军五次围剿之预定策略。陈铭枢之所为不过共匪垂暮反照之回光，绝不足以摇动吾人剿匪之政策，应格外奋斗努力，期获最终之胜利。”同时，强调陈铭枢的孤立处境，表示将严行镇压：“此次陈铭枢等不择手段，敢于联共毁党以图一逞，人格破坏，信用扫地，即向来与之同政治路线者，今亦顿生怀疑，不能参加……中正自当秉承中央之策略，尽其智能设法消弥镇压。”以防止各路将校军心动摇。<sup>[37]</sup>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充分考虑到陈铭枢是闽变的中心人物，因而集中全力攻击他，必欲去之而后快。蒋介石还派出飞机，在福建境内遍洒他的《告十九路军将士书》及各种通告、传单，仅沙县一地即拣到数万份，以此来动摇十九路军的军心。他又将原来与福建有渊源的一些军人政客，如张贞、林知渊、谭曙卿、

方声涛等，任为军事特派员，派往福建各地做拉拢收买工作。

当时，国民党系军队中，反共情绪还相当强烈，因此，蒋介石以孙中山的继承者和以国民党中央正统的地位攻击闽方改元、废旗、脱党和联共的政策，是有相当成效的。结果，蒋介石所担心的最坏的情况并未出现，各地实力派采取观望态度，而红军也并没有和十九路军协同行动，这使蒋转忧为喜，对陈诚、熊式辉等人说：“这下子可好了，形势缓和了，敌人孤立无援，闽变不足平矣。”<sup>[38]</sup> 蒋介石立即把他的主力部队调来用在平息“闽变”上。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最重视两广的反应。无论是历史渊源，还是现实考虑，举事者与两广的关系都最为密切。事变发动前夜，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曾联名致电广州西南政委会，呼吁说：“今民族存亡，迫于眉睫，弟等为情势所迫，不得不先主发动”，“望吾兄本历来之主张，为一致之行动，不特西南之福，亦中国再造之机。”<sup>[39]</sup> 要求两广响应。但陈铭枢采取了与中共联合、改元、废旗、脱党等与国民党的传统决裂的重大政治措施，让两广方面失去了回旋的余地，因此，完全不能为两广方面所接受。广西当局本倾向于支持联合反蒋。事变前，李宗仁、白崇禧一方面给福建去电，明确表示反对从江西中共那里寻求帮助，劝他们“切勿采取任何过激措施，给叛党卖国者以口实，而陷自身于孤立无援的地位……甚盼加以慎重考虑”；另一方面又给广东去电，表示“任潮、真如等被迫愤而出此，欲劝息之，不如合粤桂闽在粤成立革命政府，彼既有路可行，或不至铤而走险”。<sup>[40]</sup> 广西不愿出头，希望陈济棠出头，而陈济棠本来就不愿干，这一计划就没有实现。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采取了一系列激进措施，两广方面马上表示反对。22日，胡汉民、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复电闽方，指责闽方所为，“不特授叛党卖国者以口实，使兄等过去抗日、剿匪、护党救国之历史，荡然无存。抑且背叛主义，招致外寇，煽扬赤焰，为患无穷。此等谬举，何能得内外之同情？弟等本三民主义之立场，微论不忍苟同，且以兄等之尽丧其所守为深可痛惜也！……深冀兄等本历来护党救国之精神，幡然改图，多方劝导，以免尽入歧道，使西南团结益以巩固，救国大业得以策进。”<sup>[41]</sup> 白崇禧曾说：“南京政府的辱国丧权本来不合，但他们这样唱高调也难附合，人家想援助他们也不敢援助。”<sup>[42]</sup> 就此关上了合作的大门。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人民政府和蒋介石方面都加紧了争取两广的工作。27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再次致电胡汉民等人，说明“今日之事，莫急于讨蒋，安内攘外，要以讨蒋为先”，解释“以我军力量而论，不能不有先后之分。至于脱离国民党，亦有不得已之苦衷”，表示“未尝对西南之国民党同志有何意见”，仍愿拥胡汉民主政，陈济棠主军，“倘公等能宣布讨蒋，另组政府，则虽政见不尽相同，军事政治之合作，无不可商量。或惠临指导，亦所切望。”<sup>[43]</sup> 李济深又派徐景唐、李民欣先后去南宁，与李宗仁、白崇禧接触。结果李、白仍认为闽方走得太快，不愿参加。李、白派往福建的代表经过实地观察，认为闽方“内部复杂，决难持久”，这一态度对李、白的决定不无影响。人民政府由于自身力量薄弱，又缺乏实际有效的手段来吸引两广方面，只是凭着老关系，利用两

广和蒋介石的传统矛盾，因而对两广的争取成效不大。理想的色彩，不能代替实际的利害权衡。相比之下，蒋介石用实惠对两广进行拉拢显得有效得多。11月23日，陈济棠乘专机到赣州与蒋介石会商。不久，陈又派杨德昭到南昌向蒋汇报西南态度，蒋许以100万元的补助。陈济棠随后便封锁粤闽边境交通，封闭十九路军驻粤各机关，取消对闽协款。蔡廷锴用“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的话，来责陈济棠背信弃义，但无济于事。广西代表也应召到江西见蒋介石，蒋告诉他们要“以大局为重”。广西方面虽未落井下石，但也一直接兵不动。

此外，福建事变前，李济深、陈铭枢广为联络的湖南、四川、贵州、云南、西康、山东、陕西各省当局，事变后无一响应。国民党在野派，李烈钧在上海曾通电表示声援，张学良支持的北京《晨报》社的陈博生到福州表示：“他代表张学良来闽，张极赞成此举，决定即离法回国，不久可到。”<sup>[44]</sup>响应者寥寥，大都沉默不语。

陈铭枢原对与红军的军事合作寄予希望。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前，中共中央派潘汉年为代表驻在福州，与十九路军保持着联系。人民政府成立后，中共代表张云逸与十九路军代表陈小航（罗稷南）于11月27日在龙岩签订《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划定闽西边界，红军与十九路军之间设立中立区，双方不驻兵，恢复双方之间的通商交通往来，红军在龙岩或漳州，闽方在汀州互设代表处。此后，十九路军向红军供应了若干盐、布、药品等物资，以示善意。但是，关于军事合作问题，双方一直没有达成协议。陈铭枢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和中共代表会谈8次，其中涉及双方军队的指挥关系问题，红军方面当然不会同意拨出一部红军供陈铭枢指挥，因而始终没有达成协议。更重要的是，福建事变发生的时候，中共中央处于“左”倾路线控制下，始终认为福建事变不过是国民党内一派势力与南京争权夺利而已。12月5日，中共中央发表《为福建事变告全国民众书》，认为闽方“除了反对帝国主义与反对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等的空喊之外，并没有任何真正反帝与反军阀官僚豪绅地主的实际行动”，认为这样的结果，“它不会同任何国民党的反革命政府有什么区别，那它的一切行动，将不过是一些过去反革命的国民党领袖们与政客们企图利用新的方法来欺骗民众的把戏”。告民众书号召福建“广大工农劳苦群众立刻自动的组织起来”，进行反帝反蒋斗争。<sup>[45]</sup>12月20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致电福建人民政府与十九路军，仍然说“我们直到现在还没有看到你们积极的反日反蒋的行动”，要求闽方“采取断然的行动”，“立刻开始反蒋的决战”。<sup>[46]</sup>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中共与十九路军的合作，更多的是为获得实利，而缺少对方最需要的实力支持。中共派往十九路军的军事代表张云逸出发前，中央负责人博古指示他，设法拉些队伍过来，对出兵支持一事只字未提。张云逸到福州后，李济深向他询问红军何时可出动，张只能说不知道。毛泽东当时主张红军主力应该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威胁敌之根本重地。这样，一方面可以迫使进攻江西苏区的国民党军回援，一方面可以援助福建人民政府，迫使敌不敢放胆向福建进攻。但被共产国际派来的李德等人拒绝。实际上，中共已在11月下旬决定将红军西调，攻击江

西永丰，避开了蒋介石的嫡系部队攻击十九路军的进军路线。到1月份才令红军东调，此时十九路军已临近失败。红军东调的目的是借机扩大根据地，获取物资，并无意在军事上直接支援十九路军。“左”倾路线的领导人无视十九路军孤军抗战的光荣历史，没有认识到陈铭枢策动的福建人民政府，在民族危机深入发展的形势下，脱离国民党阵营，参加民主革命的重要意义。他们对待福建事变的关门主义的、唯我独革的短视、错误做法，使中共丧失了一次与十九路军建立军事同盟、打破国民党第五次“围剿”的机会。结果，十九路军和红军两败俱伤。

福建人民政府由于孤立无援，面临着极大的困难。首先遇到的难题就是财政困难。福建本是一个穷省，事变前的军政开销，除省内税收外，要靠南京拨款与广东协款应付。事变后，南京方面的拨款自然就停止了，而广东方面因陈济棠背盟，也停止了拨付原有的协款50万。这两方面的来源断绝，人民政府的财政立即就支持不了。财政部实行了几项措施，关税加征10%，加征煤油、汽油、火柴等税，截留统税盐税，但仍不足以应付。又向商界借款100万元，引起商界反感。支出方面，决定减低高级军官与公务员薪俸，结果使本对发动反蒋缺乏思想基础的军心士气受到影响。原曾考虑仿效中共苏区的供给制，但部队毫无工作基础，连陈铭枢都不赞成。财政困难不仅影响政府工作，而且造成市场波动、民心不安，福州一度出现挤兑风潮，甚至提款数百元亦不可得，从而动摇了政府存在的基础。

福建境内原有一些土著军队，如五十六师刘和鼎部、新二师卢兴邦部等等，共4万多人。举事前，蒋、蔡方面曾与他们有过联系，但重视不够。事变后，他们均为蒋介石拉拢收买，刘和鼎升为三十九军军长，卢兴邦为五十二师师长，并增拨军费。结果，他们成为国民党中央军进攻的内应。

福建人民政府面临的财政困难、孤立无援等事实说明，陈铭枢当初对形势的估计过于乐观了。他一方面没有认识到两广军政当局的保守性，一方面没有认识到中共当时的政策走向，更没有充分认识到自己部队的素质，错误地以为十九路军是自己一手创立的，就可以供自己驱策。这一支缺乏群众革命基础的部队，虽然有爱国的精神，但要他们不顾自己的眼前利益，改变以往的政治方向，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做到的。将领们有自己的利益需要权衡，有自己的发展欲望，而士兵们则完全缺乏相应的政治指导，并不知道自己的利益在哪里。所以，这样的部队，在蒋介石的分化、收买政策之下，很容易失去战斗力。

## 五、兵败离闽

由于红军没有策应十九路军作战，蒋介石得以在江西对红军作战采取守势，抽调兵力，集中主力部队来镇压福建人民政府。他任命蒋鼎文为第三路军总指挥，率李玉堂第三师、李延年第九师，由赣东进入闽北建阳、建瓯一带；张治中为第四路军总指挥，率王敬久第八十七师、孙元良第八十八师，由浙南进入闽北浦城、建瓯一带；卫立煌为第五路军总指挥，率李默庵第十师、宋希濂第三十六师、刘戡第八十三师，经赣东进入闽西邵武、顺昌

一带；冷欣第四师、汤恩伯第八十九师作为后续部队陆续跟进。上述部队，都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部队，在短时间内迅速调集到了福建前线，可见他扑灭“闽变”的决心。

12月上旬，蒋介石系各路军队陆续开动，虽福建地形崎岖，山高林密，但各部行进速度很快，到是月底，已基本到达攻击准备位置。与此同时，蒋介石出动大批空军，侦察十九路军的行动，连续轰炸福州、泉州、漳平、龙岩、南平等地，引起市民的恐慌情绪和经济生活的混乱。蒋介石控制的海军也在沿海不断炮击骚扰。12月下旬，蒋介石由南昌出发，亲自前往福建前线的浦城指挥作战，“沿途检阅驻军，虽一团一旅之众，亦亲临训话，砥励士气，抵浦后统筹军事。”<sup>[47]</sup>一时间，福建战云密布，大战在即，福建人民政府面临着极为严峻的局面。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时，十九路军改称人民革命军第一方面军，仍保存十九路军番号，所辖5个师改为5个军，但实力依旧，约7万余人，散布于省内各地。蔡廷锴命令官兵取下青天白日帽徽，取消国民党的党旗和国旗，由于事先缺乏思想动员，引起了部队思想的波动。当时，第一军驻闽北沙县，第二军驻沙县、泉州，第三军驻福州、莆田，第四军驻闽西龙岩、永定，第五军驻福州西的水口、延平、古田，还有若干总部直辖部队驻漳州、厦门。福建乃四战之地，除西面因与红军订约可以不设防外，其它几面都不能不防，而十九路军缺乏机动能力，又没有战略后方依托，军事上先天即处于被动地位。

军事委员会是人民政府属下的军事决策机构，但自成立后终日忙于一般性事务。陈铭枢原来估计，蒋介石的主力在江西受红军牵制调不出来，可以调动的不过二三万人，而十九路军的战斗力可以一当二，因此对敌情的严重性未予重视。12月底，红军方面提供的情报说，蒋介石系两个师已经过江西的黎川，东向福建境内推进。但陈铭枢认为：“江西境内有红军，当可以把蒋军击退，不必顾虑。”<sup>[48]</sup>他以为红军可以为他挡一阵子。军委会成立后，既未制订全盘战略计划，也未制订应急措施，对己方部队的情况也疏于了解，白白浪费了许多宝贵时光。

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的第三天，闽北沙县即遭到蒋介石的空军轰炸，其后省内各大城市均遭轰炸。情报显示，蒋介石正调集主力准备进攻福建。但人民政府领导人直到12月中旬才判断蒋介石决心动武，而且对方兵力远远超过原先的估计，这才引起重视。军事委员会遂召开紧急会议，分析敌情，提出应战方案。会议由李济深主持，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邓世增、李章达等及一些军事幕僚参加了会议。蔡廷锴主张，集中兵力于闽北，首先消灭危害最大的土著刘和鼎部，然后在建瓯以南、顺昌以东地区与敌作战，争取击败敌先头部队，占据有利的战略地位。蒋光鼐则认为，敌人力量强大，我即使小胜亦无益于全局，而且主力拉出作战，万一失利则更对我不利。他建议将部队撤至闽西南，背靠红军作持久战，或将主力部署于闽东，乘虚进入浙江南部，打乱敌之计划。陈铭枢、李济深、黄琪翔则认为，福州是我心脏，非至万不得已不能放弃；我军力量有限，不宜分散使用，应集中主力保卫福州，以扩大政治影响；闽北、浙南计划太冒险，闽西计划又太

消极，不能赞成。这是一个政治利益的权衡重于纯军事利益的决策，结果，与会者大多数同意陈铭枢等的方案，把坚守福州作为战略目标。

根据军委会的决定，实际指挥军事的蔡廷锴着手变更部队的部署。他令第一军集结于福州西北；第二军除一部驻泉州外，其余集结于福州以北；第三军集结于福州、马尾；第四军开往福州，作总预备队；第五军为前方战略据点守备部队，军部驻水口，第五师赵一肩部驻古田，第六师司徒非部驻延平，成三足鼎立之势，以确保福州外围安全。在当时十九路军总兵力 33 个团中，集中福州的就有 21 个团。部署既定，邓世增开始率领各军参谋人员制订作战计划，侦察地形，督修工事，贮足粮弹，准备即将来临的大战。事后看起来，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三人的方案各有利弊。坚守福州固然有很大的政治意义，但是福州三面环水，一面靠山，十九路军又无海空力量，大军聚集于此，回旋余地太小，这种单纯防御、消极挨打的部署不如在广大范围内采取机动作战更为有利。而且，十九路军因此而主动放弃闽北建阳、建瓯、浦城、邵武、顺昌等 13 个县，更使自己在战略上处于被动地位。当然，采取机动作战，在十九路军反蒋意志不统一的严峻形势下，统帅部在控制部队上，会更困难一些。坚守福州的战略部署，恐怕也有这方面的政治考虑。

1934 年 1 月初，蒋介石系各部开始与十九路军发生接触。八十七师先与赵一肩部在古田外围发生前哨战，接着三十六师开始炮击延平外围工事。军统在福建的情报网早已收集了十九路军部署和内部人员，如总部参谋、译电科长等的情报，对十九路军动向了如指掌，他们知道十九路军采取收缩防守策略，因而各部放胆攻击，几无后顾之忧。

十九路军自入闽之后，一直由蔡廷锴指挥。蔡本来就对举事时机有看法，对军委会决定守福州的方案也持保留态度。他了解下属的实情，认为敌人至少超过自己二倍，从纯军事上来说，福州是守不住的，因此他不能不预作准备，来对付军事上不可避免会出现的危机。他在征得陈铭枢、蒋光鼐同意后，派参谋长邓世增回广东与陈济棠交涉，要求万十九路军后撤闽西南时，广东方面能让出闽粤边的 8 个县作为十九路军驻地，并能派部队在闽南支援十九路军。他另派军需处长黄和春回广东提款，作为十九路军经营闽西的经费。在此之前，蔡还派出参谋处长尹时中前往瑞金，请求红军的支援。

就在蔡廷锴调整部署之际，军事委员会再次变更了作战计划。1 月 5 日，军委会开会，李济深、陈铭枢等提出，延平、古田为闽北咽喉，福州屏障，得失至关重要，得可以确保福州，击败敌军，失则福州动摇。他们决定要蔡廷锴率部增援延平、古田两地。蔡廷锴未参加这次会议，会议决定也未征求他的意见，但他还是根据决定作了新的部署。他派毛维寿为右路军指挥，率第二军及第三军一部增援古田；沈光汉为左路军指挥，率第一军及第三军一部增援延平。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随蔡总部进至白沙。

1934 年 1 月 5 日，蒋介石亲自指挥各部，开始攻击延平，先集中全部炮兵及大部分空军猛烈轰击延平城外高地，随后三十六师宋希濂部向九峰山发起进攻，经一日激战，攻克九峰山。延平屏障已失，第六师师长司徒非向刘和鼎接洽投降。6 日夜，水口受到李延年

部攻击，守军因众寡悬殊，不久即告失败，第五军军长谭启秀只身逃出，次日水口失守。福州外围据点只剩下古田一地。围攻古田的是张治中指挥的八十七、八十八师，张治中部是“一·二八”抗战时与十九路军并肩作战的战友，今日不幸而成为敌人。张治中估计攻坚必伤亡严重，因此亲笔写了封信，送给守军师长赵一肩，晓以利害，劝其归诚。张治中顶住了蒋介石与蒋鼎文要他立即攻城的指示，反复做赵的工作。赵一肩见困守孤城，增援无望，只好决定投降，1月12日古田落入敌手。蒋介石嫡系部队占领延平、水口、古田之后，卫立煌部有向闽南运动的趋势，十九路军面临被敌军全面包围的危险。

还在延平、水口失守的时候，福建人民政府领导人就意识到局势的严重。1月9日夜，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黄琪翔等在白沙开会，讨论行动方案。蔡廷锴力主立即向闽南撤退，否则后路被截，全军将陷绝境。陈铭枢起初还想让部队逐次抵抗退守福州，不愿放弃福州。蔡廷锴反复说明利害得失，认为敌人行动迅速，我军军心已乱，福州肯定守不住，再不撤就很难撤出来了。蒋光鼐则没有发言。最后，蔡廷锴发问说：“现在，谁是总司令？”此语一出，大家默然。<sup>[49]</sup>陈铭枢想行使对军队的指挥权在事实上已不可能了。陈铭枢最后接受了蔡的意见，决定撤退。陈铭枢、蒋光鼐、黄琪翔当夜赶回福州，部署撤退。

1月10日，李济深、陈铭枢宣布将暂时放弃福州，与国民党军择地再战，起事重要人员不必随军行动，可先去香港，等军事稳定后再回来。彭泽湘等表示强烈反对，要求电请红军支援，陈铭枢同意了。但事实上战局已无可挽回。于是，陈友仁、徐谦、章伯钧、余心清、梅龚彬、胡秋原等先后乘轮船离开福州。1月13日，陈铭枢、李济深、蒋光鼐、黄琪翔乘飞机到达泉州。当时，正在泉州的翁照垣得知部队不战而退出福州，非常愤怒，和陈铭枢大吵了一场。陈遭到了两面的夹击，真是十分为难。然后，他们一行步行前往闽西龙岩。在得知十九路军已经失败的消息后，他们决定不在闽西坚持，而逃往香港。广东方面只允许李济深与蒋光鼐经粤去港，李、蒋两人从永定乘飞机到汕头，26日到达香港。陈铭枢、黄琪翔与周力行（士弟）夫人化装成舅舅和外甥，潜赴粤境。当时闽粤边境防范甚严，到处在搜查陈铭枢。何公敢过境时曾被疑为是陈铭枢，立即被带至警察所，后经人证明才被释放。陈铭枢、黄琪翔化装过境时，得到福建土著钟绍葵部的帮助，又装扮成钟部采购员，搭上持有通行证的小船，从水路到了潮州，于2月间终于辗转平安到达香港。<sup>[50]</sup>

福建人民政府领导人撤离福州后，人民政府即告解体。蔡廷锴在福州部署十九路军撤退工作，决定在漳州继续设立政府，在泉州设立总部。1月15日，蔡廷锴离开福州。次日，蒋介石嫡系部队占领福州，并继续南下追击。1月17日，蔡廷锴到达泉州，行进途中，他的坐车几遭袭击。到泉州后，蔡召集各军、师长开会，决定行止。当时的情况是：蒋系部队已于1月10日在厦门登陆，汤恩伯部正向泉州以南的同安、安溪前进，准备包围十九路军。而十九路军内部将领出现分化，毛维寿等态度暧昧，有意另谋出路。蔡廷锴认为有组织的抵抗已不太可能，在会上宣布部队由毛维寿代理指挥，以安毛心，部队向闽西突围，以保存力量，自己则飞赴龙岩等候，如各部不愿西进，由指挥官自决。此时，广东胡汉民、

陈济棠有兔死狐悲之感，都表示，十九路军番导应予保留，部队可以改编，负责人出洋，蔡廷锴离队。想以此条件与蒋介石谈判，以保存十九路军。

蔡廷锴离开部队后，毛维寿等强调蔡廷锴已有自由行动的指示，部队既无法后撤，也不能抵抗，只能求和，因此与蒋介石嫡系部队接上了关系。21日，十九路军4位师长沈光汉、毛维寿、区寿年、张炎联名发出通电表示：“同室操戈，贻害邦国，智者不为。光汉等决议一致脱离人民政府，拥护中央，促李、陈、蒋、蔡诸公先行离开，并推戴戟出任维持，一切政治问题静待商决。”其后，十九路军被改编为五省“剿匪”东路军第七路军，毛维寿、张炎分任正副指挥。过不多久，4个师分别开往河南、安徽整训，营长以上军官全部撤换，虽然师的番号得以保留，但物是人非。曾在民国军事史上威名赫赫的十九路军被蒋介石所肢解，成了一个历史名词（蔡廷锴后来曾图谋恢复，但为时很短，也没有成功）。福建事变也因十九路军的解体而告最终失败。

蔡廷锴到达龙岩后，收拾十九路军残部4000人。这里地处闽西，西边有红军，南边有粤军，都不会来侵扰，东边蒋系部队一时也不敢贸然进兵，所以蔡廷锴有充分时间决定今后的去向。一条路是到江西参加红军，中共是欢迎的，周恩来还让尹时中致电蔡，要他打起红旗继续革命。蔡廷锴对红军未能在事变中全力支持，深为不满，又怕残部不多，进入苏区后不能立足，故未走此路。另一条路是在闽西打游击，但蔡担心部队没有这种经验，不敢下决心。恰在此时，参谋长邓世增带回广东陈济棠的意见，希望将十九路军残部改编为一个独立旅，暂归广东指挥。蔡廷锴认为这样可以为十九路军保存一点东山再起的力量，便同意了方案。该部改编后不久，即为陈济棠缴械遣散。据陈说，是蒋介石知道后不容十九路军继续存在，不得不如此办理。蔡廷锴本人则于2月中旬离闽去香港。陈铭枢精心经营十多年的一支精锐部队，为了抗日反蒋，而被蒋介石彻底瓦解了，连一个师的建制，都不能在保持传统的前提下延续下来。这在国民党的派系斗争中，是绝无仅有的。陈铭枢本人也就在军政界失去了力量，失去了立足之地。

当然，所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福建事变的迅速失败，也和陈铭枢的个人性格与处事方式有着密切的关系。不少人批评他处事专断、独揽一切、不善于听取别人意见，也是事实。陈铭枢的若干决策确有仓促之处。他当时认为，中华民国已名不符实，国民党已变质，应取消党国旗。改元废旗一事，虽给人以耳目一新的感觉，但事实上缺乏思想基础，又错误地放弃了孙中山的旗帜，只是造成内部的混乱和自己的孤立，是很不策略的。对此，蒋光鼐也感到不满意，当他事先没有见过的新国旗升起的时候，就非常生气。至于军权问题，本是一个敏感问题。问题在于，陈铭枢对军队的控制早已被削弱，他如要军队服从新的政治路线，就不能不依靠群众运动，来改造军队的基础。但是，陈铭枢和福建人民政府既来不及也没有懂得这个道理。他想重新掌握军队的指挥权，就只能加深人事矛盾和纠纷，与事无补。当然，从根本上说，在中国，没有中国共产党和无产阶级的领导，民主革命就不能成功，这是福建人民政府失败的关键。陈铭枢后来回忆说，王礼锡在淞沪抗战期间，曾

提出过组织“市民抗日政府”的问题，但王自己就怀疑说，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力量同样薄弱，将以哪个阶级来主持这个“市民抗日政府”呢？又以哪个阶级的利益为主呢？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新的政权便建立不起来。陈铭枢于是反省说：“由于我过分自信能够联合多数的抗日反蒋的派别，又深信全国军民能够结成军民一体来共同抗日。但自从‘福建人民政府’成立后，他的这段话不啻是现实的写照，同时，在我和蒋光鼐的心情中，也都笼罩着这个阴影，不过那只是后来的事了。”<sup>[51]</sup>这就是说，陈铭枢和他的朋友们，虽然有民主革命的要求，但他们还不了解，中国革命应该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

## 六、坚持抗日救国

福建事变失败后，有关人员陆续到了香港。由于“一·二八”抗战时，十九路军得到过一些海内外捐款，此时还余下一部分，加上历年公积金的结余款，正好用来安置流亡海外的人员，吃、住还不用发愁。陈铭枢并没有灰心，到香港后总结了福建事变失败的经验教训，决心从头做起。而且，经历了这一次事变，陈铭枢与蒋介石的关系已经决裂，再行动时也减少了早先的顾虑与牵扯。

福建事变最主要的几位领导人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于2月中旬在香港聚会，讨论今后的行动计划。大家决定着手做几件事，1、招兵买马，重新建立军队；2、进行军事策反，同时推动粤桂当局反蒋；3、在香港办报，开展抗日反蒋的舆论宣传工作；4、建立一个领导抗日反蒋活动的政治组织。<sup>[52]</sup>陈铭枢主张先做前两件事，同时准备后两件事。由于李济深不久回广西梧州老家暂避，蔡廷锴出国游历，因此前一阶段的工作主要是陈铭枢与蒋光鼐在做。

陈铭枢是军人出身，又以领导十九路军在军政界立足，自然深知军队的重要。为了重新建立军队，他与李济深、蒋光鼐、蔡廷锴请广西当局成立一个团，专门用以安置十九路军离散官兵，对外则称桂军，费用由十九路军公积金支付。他们想以此为基础，逐步扩大，但广西当局担心因此而惹事生非，一直未予实施。直到1936年两广“六，一”事变期间，李宗仁、白崇禧为壮大反蒋声势，邀蔡廷锴入桂重组十九路军。但不久，广西与南京方面妥协，十九路军的重建工作又悄无声息了。寄人篱下，终受人所制，重建军队的工作也就没有什么成果。

军事策反工作是分两方面进行的，一是对蒋介石直接控制下的军队的策反，一是对福建民军的策反。陈铭枢委派林植夫、尹中对蒋系军队进行策反，但今非昔比，陈铭枢已没有了当年的地位，仅仅以言辞相劝，是很难拉来什么部队的。其间，陈认识一个叫周游的人，吹嘘自己有办法，可以说动关麟徵抗日，陈就让周帮助做这个工作。但林植夫“觉察周游这人靠不住，言大而夸，更长于拍马屁”，便劝陈不要上当，陈不听，结果不仅队伍没拉来，还给周游骗去了一笔钱。<sup>[53]</sup>陈铭枢由此暴露了他容易轻信的弱点。对福建民军的策反起初有些成效、这项工作由翁照垣负责军事，何公敢负责政治，在香港网罗了福建来的民军首领，如龙岩的谢再发、平潭的商诚学、德化的张雄南、葛越溪等，再通过他们派

人回福建活动。后来因为经费短缺，工作难以为继，福建的活动又受到省当局的严厉镇压，民军首领也在当局的引诱下离开香港，这项工作无形中停止了。此外，陈铭枢和李济深一起，还参与了组织暗杀蒋介石的工作，给了一个职业杀手王亚樵一笔经费，让他从事暗杀活动。

组军与策反工作进行不顺利，陈铭枢就把工作重心移向宣传和组党。宣传工作由梅龚彬负责。大约在1934年秋，《大众日报》在香港创刊，使他们有了一个重要的舆论阵地。据梅龚彬说：“《大众日报》办得颇有特色，不仅在香港有影响，而且在华南数省和南洋一带都拥有热心读者。办报纸不但建立了抗日救国宣传阵地，而且安插不少干部在报馆工作，真是一举两得。”<sup>[54]</sup>

组党一事遇到一些争论和曲折。福建事变失败后，原有的生产人民党解体，成员散布各地。因此，对于整顿队伍、吸收新人、成立组织、继续战斗，大家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对于成立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各人却有不同看法，为此而引起的争论竟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因为有生产人民党的先例，陈铭枢与李济深最初倾向于组建一个政党，但蒋光鼐和李章达不赞成成立新党。他们认为，组建新党在当时情况下无非网罗一批失意官僚和投机政客，不会有什么战斗力，对外也不会有号召力。从现实出发，他们主张先搞一个以抗日为目标的政治团体。蔡廷锴回国后也支持蒋光鼐等的主张，对组党不感兴趣。由于李济深不在香港，蒋光鼐等人主要是做陈铭枢的工作。梅龚彬劝陈，先搞一个团体，然后同上海以及全国的抗日救国团体联合成更广泛的抗日反蒋阵线，并向陈介绍了有宋庆龄、何香凝等人签名的《中国人民对日作战的基本纲领》。陈铭枢在大家劝说下，表示少数服从多数，收回了组党的意见，同意组织政治团体，并参加广泛的抗日反蒋阵线。经过大家协商，决定组织一个以十九路军干部为主体，并包括其他方面抗日人士的中华民族革命同盟。组建团体一事正在进行时，李济深从广西老家回到香港，事情重起波澜。第三党的一些人出于种种原因，主张由李济深领头组党，并说什么不主张组党的人是“不尊重任公的领导地位”。李济深听了汇报后，就主张停办同盟，转而组党。经过不主组党人士的说明解释，加上原先主张组党的不少人又因其它原因纷纷离去，李济深也采纳了大家意见，同意先组织一个政治团体。<sup>[55]</sup>

1935年7月下旬，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在香港成立。同盟实行集体领导，中央委员会由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李章达等人组成，李济深任主席，下设秘书处、组织处、宣传处。在李济深不在时，陈铭枢、蒋光鼐也曾代理过主席职务。同盟主张“在抗日共同目标下，除积极的亲日派外，任何党派本同盟均可携手”，现时“必须从抗日反蒋开始”，组织上“必须严密并注意秘密工作”，“宣传工作与群众运动采取公开路线”。<sup>[56]</sup>同年12月，同盟发表政治宣言，以“争取民族独立，树立人民政权”为纲领，并提出8项具体行动目标：对日作战；收复失地；推翻南京政权；召集人民代表大会；驱逐日帝；打倒日帝；铲除贪污；争取人民各项自由。<sup>[57]</sup>1936年1月4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

廷锴联名发表《对时局宣言》，7月又提出了《目前行动纲领》。在这两个文件中，他们谴责南京政府对外妥协、对内独裁的政策，要求成立国防政府、抗日联军、救国会议，实现全民团结抗战。他们还提出了“联共联俄抗日救国”的主张，认为“联共为统一救国之关键”，“联共又为统一救国之枢纽”，“我们还愿意其他一切抗日力量大家联共，并且大家联合”。<sup>[58]</sup>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立后，积极进行抗日救亡活动。同盟的宣传工作仍由梅龚彬主持，宣传机构就设在香港陈铭枢家中。除了原有的《大众日报》外，又办了一个不定期刊物《民族战线》，一份小型半月刊《在抗战旗帜之下》，所刊文章短小活泼，很受欢迎。同盟与救国会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李章达担任华南地区救国会主任委员，工作得到各方称赞。同盟积极支持广州中山大学师生的抗日救亡活动，中大左派教授何思敬和一些进步学生，因参加抗日救亡运动，受到陈济棠的迫害，不得不来港避难时，同盟帮助他们解决了生活上的困难。陈铭枢通过与何思敬的接触，受到他不少影响，后来写了一篇文章，反省国民党“清党”的错误，认为必须国共重新合作，一致抗日救亡。文章发表后产生了很大影响。第二年，陈铭枢在《救国时报》上发表了《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立一周年》一文，谴责蒋介石“对内则安，对外则攘，高唱统一救国，而以武力残民为统一，以屈膝和戎为救国”，主张“联合战线，武装抗日”。<sup>[59]</sup>

中华民族革命同盟广泛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很快将组织与活动扩展到了广东、广西、福建、江西、湖南、上海、华北各省以及德国、法国、英国、美国等地。同盟在发展过程中，与中共一直保持着联系。还在1934年春，福建事变失败后刚刚到香港的陈铭枢，就派梅龚彬回上海找中共商谈双方合作问题。梅与已经出狱的胡鄂公接上关系，胡要他回香港后积极促进原福建人民政府领导人反蒋。此后胡长驻香港，与梅保持着联系。陈铭枢还曾派原十九路军的一个军官俞献诚，到长江上游川鄂交界处找红军联系，但没有结果。

1936年春，陈铭枢离开香港，再度赴欧洲游历，先后到过法国、英国、比利时、瑞士等国，并应邀访问了苏联。

福建事变前后，陈铭枢的思想向左转，在读了一些马克思主义书籍后，对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很想去看看。到香港后，他与中共方面的人士常有接触，更促进了他思想的变化。他的朋友胡秋原于福建事变失败后，带着他的长子到了英国，后来又应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之邀，到莫斯科帮助编辑《救国时报》。或许是通过胡秋原，中共代表团知道了陈铭枢的访苏愿望，共产国际就邀请陈铭枢去苏联访问。1951年，陈铭枢曾回忆说：“1936年我应第三国际（中国共产党？）之邀赴莫斯科（原欲我与鲁迅先生同往并照顾他，后他病了不能同去），在我临行前尚被某黄埔学生造许多黄埔大军官签名的假文件给我拿去，我竟惘味不灵，贸然交给王明和康生两同志了！”<sup>[60]</sup>因为中共当时已经决定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陈铭枢及中华民族革命同盟自然是重要的统战对象。陈铭枢的第二次欧洲之行便由此而来。

由于陈铭枢将从香港前往莫斯科，王明希望趁机邀请鲁迅同来莫斯科。他就请胡秋原代为向陈铭枢转达，请陈在动身前派人去上海，把第三国际中共代表团的意思，转告鲁迅，希望鲁迅夫妇能够到香港和陈铭枢一起同行，路费也请陈铭枢一起解决。陈铭枢准备访问苏联之前，即化名打电报给在日本的胡允恭，请他来港同行。但胡曾受过王明路线的打击，不便同行。不过，他从香港回日本时，受陈铭枢之托，带信到上海，面见鲁迅，转达中共代表团的邀请，并向鲁迅转告：“苏联政府已经考虑了，先请真如先生代筹一万元港币，由苏联归还。他一切都准备好了，包括你的夫人、孩子到港后，都住真如家，而且你和真如一道去苏，要方便得多。”<sup>[61]</sup>鲁迅对苏联政府和陈铭枢的好意表示感谢，但说明自己不拟赴苏，因为一则自己要工作，不愿向反动派示弱，二则正预备编辑被国民党杀害的瞿秋白的遗著。鲁迅未能成行，不久即因病逝世。在当年11月巴黎各界华侨追悼鲁迅先生的大会上，陈铭枢演说谈及此事时还不无惋惜之意。

陈铭枢到欧洲的时候，正逢国际关系处于大变化的前夜。德、意、日法西斯的侵略活动，引起越来越多的各国进步人士的关注，国际反法西斯侵略运动正在兴起。共产国际主张成立国际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也推动了这个运动的发展。正在伦敦的王礼锡与各国政治活动家有不少联系，成了国际反侵略运动的积极分子。陈铭枢到欧洲后，正值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因为王礼锡的关系，他被推为参加大会的中国代表团首席代表，代表团中还有正在欧洲的陈友仁、熊式一、黄少谷、王礼锡、胡秋原，以及中国国内来的陶行知、钱俊瑞等共9人。

1936年9月3日，国际反侵略运动大会在布鲁塞尔开幕。来自37个国家的4000余位代表出席，10000多人参加，代表与参加者中，包括了各国政界领袖、议员、文人、学者、商人、工人和农民。大会主席一为英国贵族、著名和平人士薛西爵士，一为法国航空部长、左派人士皮尔郭，秘书长是法国共产党员杜纳特，英国知名人士丘吉尔、李顿、捷克总统贝奈斯、比利时前总理范德威、法国知名人士朗之万等都是大会的积极支持者。大会下设7个组，孙科、陈铭枢被选为总会理事，中国也是执行部中唯一的东方国家。大会纲领要求各国遵守条约尊严，裁减军备，建立集体安全与互助，消除引起战争之原因。大会“唯一目的，即在全世界各国民族不分强弱，在完全平等条件之下，共享和平之幸福”。中国代表团在会上发出《告世界和平及中国之友书》，提出：1、日本侵华即破坏世界和平，中国抗日亦是为世界和平奋斗；2、拥护国联实施盟约制裁日本；3、召集九国会议，并望苏俄参加，保护远东安全；4、世界和平及中国之友应一致援助中国统一抗日运动。<sup>[62]</sup>声明得到了各国与会代表的签名支持。

陈铭枢旅欧期间，积极参加社会活动。1936年10月，全欧华侨抗日大会在巴黎召开，康生、陶行知、钱俊瑞、李杜、方振武等人参加，决定成立全欧华侨抗日联合会，总会设在巴黎，陈铭枢当选为5位常务理事之一。他在会上作了题为《国共两党及一切抗日党派联合抗日为救国之第一步》的演说，“情词庄挚沉痛，一片赤诚，全场多为之泣下”。陈铭

枢最后带领全体与会者高呼：精诚团结一致抗日！联合全国武装力量组织全国抗日军！国共合作、各党派合作！<sup>[63]</sup>中共主办的《救国时报》，印刷和发行都在巴黎，也得到了陈铭枢的帮助。陈与在巴黎的中共领导人常有接触，他还介绍中共领导人康生与中国驻法大使顾维钧见过面。

陈铭枢是与王礼锡夫妇一起去的苏联，参加了在莫斯科红场上举行的十月革命庆典，实地考察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情况，思想上很受触动。他在莫斯科会见了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王明，据他自己回忆，在王明请他吃饭时，周围人都举杯“为我们的领袖王明干杯”，他当时颇感诧异。<sup>[64]</sup>

陈铭枢在国外时，中国政治形势又面临着新的变化。中华民族革命同盟成立的初衷是反蒋抗日，两广“六·一”事变时，李济深、蔡廷锴都积极参加了。此后，随着形势的变化，同盟内的多数人认识到全国一致抗日的重要，中共也向同盟解释了自己的“逼蒋抗日方针”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致信蒋光鼐、蔡廷锴，提出为推动全国抗日战争的进行，双方可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并祈转达陈真如先生及十九路军各同志”，同时提到“真如先生何时归国，深以为念，弟等甚盼其迅速回国，从事统一战线之伟业。”<sup>[65]</sup>1936年12月，陈铭枢从欧洲启程回香港。船过印度洋时，他得知西安事变的消息，但不知详情如何。他虽感到突然，但并未以个人恩怨代替理智思考，而是认为蒋的被扣不是个人问题，如蒋被杀，国民党权力转移发生混乱，国事前途不堪设想。他在船上起草了一封长电，花了几百元发给蒋光鼐与蔡廷锴，要他们通电呼吁和平解决争端。这个通电是由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联名发表的，通电提出5项主张：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开放政权，肃清亲日派；召集救国会议，实现民主自由；停止对日外交谈判，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划分国防区，强固国防。<sup>[66]</sup>陈铭枢回到香港时，西安事变已经和平解决，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局面正在形成。陈铭枢表示赞成中共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他主持召开了同盟高干会议，统一了大家的认识，并请到过延安的人做报告，讲解中共的情况与政策。他还在《民族战线》上发表文章，要求实现全面抗战。陈铭枢渴望在即将到来的全民族抗战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 注释

[1][31][33] 陈铭枢存福建事变手抄资料。

[2][9][16][64] 陈铭枢未刊回忆录稿。

[3][5][6][10][13][15][23] 《蔡廷锴自传》，第309-310页；311页；309-310页；307页；311页；310页；422页。

[4][7][19][20] 蔡廷锴：《回忆十九路军在闽反蒋失败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

[8][28][29][35][36][37] 薛谋成、郑全备编：《福建事变资料选编》，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页；116页；87页；196页；199-200页；201页。

[11][51] 陈铭枢：《我的回忆》，《天津文史资料选辑》第62辑。

[12][24][39][41][43] 存萃学社编：《1927-1934年的反蒋战争》，第617-618页；658页；670页；671页；672-673页。

- [14][18] 蒋光鼐：《对十九路军与“福建事变”的补充》，《文史资料选辑》第59辑。
- [17][25][27][32][34][45][46] 福建省档案馆编：《福建事变档案资料》，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95-196页；8页；12-13页；32页；96-97页；154页；197页。
- [21] 陈公博：《苦笑录》，香港1980年版，第308页。
- [22] 《蒋光鼐将军》（年表），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第249页。
- [26][47] 《国闻周报》第10卷第49期；第11卷第6期。
- [30][44][49][50] 何公敢：《“福建人民政府”和“生产人民党”片断》，《福建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
- [38] 符昭骞、郑庭笈：《蒋介石消灭十九路军战役的经过》，《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
- [40] 程思远：《政海秘辛》，北方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73-74页。
- [42] 转引自申晓云、李静之：《李宗仁的一生》，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05页。
- [48] 麦朝枢：《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回忆》，《文史资料选辑》第37辑。
- [52][54][55] 《梅羹彬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4年版第86页；87页；89页。
- [53] 《林植夫自述》，《福建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
- [56][56] 王德夫、楼开昭：《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历史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8页。
- [57] 《抗战中的中国政治》，1957年版第442页。
- [58][59][63] 张军民：《中国民主党派史》，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73页；171页；176页。
- [60] 陈铭枢：《结合“批判儒家思想”的自我检讨》，《现代佛学》第2卷第10期。
- [61] 胡允恭：《金陵丛谈》，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79页。
- [62] 陈铭枢：《反侵略的国际和平运动大会之意义及经过》，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藏。
- [65] 《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4页。